

第十七章 民族奴化

所谓“国民组织化”

1936年协和会改组后，它被明确地定为伪满的“国家团体”，从此它与伪满政权“表里一体”，竭力从思想上奴化、从行动上奴役、从组织上控制广大群众。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为迫使东北人民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形式奴化、奴役和控制群众，而名之曰“国民组织化”。

首先是对青少年，进行青少年训练，成立青少年团。伪满洲国出笼伊始，“满洲国童子团”即应运而生。1937年1月28日，伪满军政部、民生部、蒙政部联合公布《青年训练规程》，着手由协和会推行青年训练。设在各地的青年训练所，在向青年阶层灌输奴化思想，消磨民族意识的同时，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妄图把东北青年训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与工具。1939年，协和会的青年训练所已增至192所，它们都受伪满军警中枢的治安部的干预。不过，此类训练，对象毕竟有限。对青少年的全面“组织训练”始于1938年5月15日协和会《青少年组织大纲》的发布。从此，各地以各种目的组织的各种名目的青少年团体，诸如铁路爱路青少年团、学校童子团、日本在满少年团等等，悉数合并于协和青年团和协和少年团，实行协和会青少年组织的一元化。协和青年团由16至19岁青年构

成，训练目标是使之可能成为各种伪机构的骨干；协和少年团由10至15岁少年构成，进行青年团的基础训练。伪满转入战时体制后，协和会机构随之扩大。新设立的辅导部即从事青少团的建立、指导和训练。1941年8月5日，作为协和会的外局，特别设立了中央青少团总监部，同年6月又改为青少年团统监部。青少年团并未取代青年训练所。此外还有“青年塾”的设置，它是控制、训练农村青年的据点。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协和会青年行动队，它实际就是协和会特别工作班和别动队，配合日伪警宪、行政官署，从事谍报、“宣抚”和物资掠夺。青年行动队不多，其活动多限于武力“讨伐”地区。协和会控制奴役青少年的主要目的，是把青少年变成战争奴隶。如协和会驱使青少年所实行的“国民勤劳奉仕运动”，所从事的劳役多种多样：修建“建国神庙”、筑路修桥、“献纳马粮”、收获农产品、为“讨伐”队运送物资，等等。1941年被迫参加“勤劳奉仕”的青年团员达265万人。此后更有增无已。

其次，对成年人控制与奴役的主要形式是协和义勇奉公队。因“奉公队”身着制服，手执木棒，故人称其为“棒子队”。“奉公队”于1938年7月首先出现于伪安东省，前此，同年7月14日伪满国务院曾发布设立“奉公队”的训令。诺门坎事件爆发后，1939年7月随着伪满《防卫令》的发布，“奉公队”亦随之而被加强和扩充，日伪军方妄图把“奉公队”变为重要的警护力量。所以，1940年大规模扩建“奉公队”并非偶然。协和会企图通过“奉公队”，到达“国民训练”“国民组织化”和“确立动员体制”的目的。“奉公队”并非仅用于所谓“防卫”，而被驱使在各方面。所以日伪当局称“奉公队”为“思想战士”、“国民兵”、“预备军队”、“预备警察”等等。“奉公队”组织网络庞大，

协和会中央设有中央总监部，省设省总监部，市县旗设有总队本部。根据1939年7月的《防卫法》，‘奉公队’以警护形式出现，分为基本组织和特殊组织。前者又分为‘地域队’^①和‘施设队’。顾名思义，‘区域队’即按队员居住地区编的队；而‘施设队’则是以单位为基础组建的队。‘地域队’与邻保组织保持一体关系，邻保组织的班、组长充当‘奉公队’的班、组长。特殊组织，因地而异，有高射炮队、高射机枪队、卫生队、消防队、汽车队、爱路队，以及某地‘勤劳奉仕’的特殊劳动队，等等。到1942年，全伪满洲国的‘奉公队’，共有80个总队，392个区队，1780个分队，222个特殊队，队员总数达34万人。^①‘奉公队’员是强行征集的，凡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的男性均在被征之列，后来年龄的最高限又延至45岁。‘奉公队’要经受种种训练。协和会各级组织均设有训练机构。‘奉公队’被用于‘警护’、‘勤劳奉仕’、‘物资配给’，以及‘思想战’等各方面，故其训练科目亦颇繁多，不过始终以所谓精神训练为‘第一义’，其他训练以‘警护’为重点。‘奉公队’是控制与奴役城乡男子的重要组织，在城镇尤其如此。如果说，在伪满前半期，自卫团是殖民统治的辅助力量，那么在伪满的后半期，‘奉公队’基本上取代了自卫团，只在某些乡村仍残留着自卫团。不过，‘奉公队’与自卫团不同，它被用于‘防护’的各个方面，且以政治统治中心和经济掠夺的重点地区为主。

再次，协和会推行‘国民组织化’的对象是，知识界和社会其他各阶层。前面所说的青少年团和‘奉公队’都是协和会直属团

^① 协和义勇奉公队中央总监部总务中井重义：《协和义勇奉公队之使命与现状》，《满洲国政指导综览》，1944年，第644页。

体，此外，还有两个特殊的直属团体，即开拓部会和科学技术部会。下面还要述及，协和会的基层组织是分会，它由一般会员组成，而该二部会则以具有专门知识与技能的会员所组成，因为他们对于当时推行的“开拓移民”和经济掠夺具有特殊意义，故以特殊部会形式予以控制。不仅如此，协和会为把知识界和信仰各异的不同阶层都控制起来，以外围团体和关系团体的形式，将社会和宗教团体控制起来。诸如国防妇人会、军人后援会、满洲防空协会、满洲红十字会等。此类团体本身实际上早已成为日伪官方直接插手的官办团体，只因它们拥有广泛的分支机构和数量可观的成员，协和会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属下。基于同样宗旨，协和会将无法作为外围团体的团体统通作为关系团体，如兴农合作社、商工协会、红十字会、道德会等，统一实行所谓“思想指导”。

最后，协和会通过分会和所谓国民邻保组织，全面控制一般会员和广大群众，以达到所谓“国民组织化”的目的。分会始终是协和会的基本细胞，是“会运动的主体”。但分会有地域分会和职场分会之分。不过，分会还不是协和会的最基层。协和会的末梢组织是和行政系统的基层组织合二而一的。1941年2月3日，伪满国务院发布了《国民邻保组织确立要纲》。是时太平洋战争虽尚未爆发，但国际形势已转趋紧张，日本帝国主义的玩火政策已经确定，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迫在眉睫。建立“国民邻保组织”，名曰“邻保互助”，实乃“遂行国策”，这才是“国民组织化”的根本目的所在。既然称之为邻保组织，自然是按地区由“全住民而构成之”，但“要纲”规定“以协和会员为中核”。农村，在街、村以下的屯设邻保组织称为“牌”，城市，在区和分区的班之下构成邻保组织，称之为“组”，而屯长、班长、牌长、组长悉由协

和会员充当。^①这样，邻保组织便成了行政系统和协和会共同的末端组织。“要纲”明确规定“国民邻保组织之结成及指导育成，由行政机关及协和会协力一致而担当之。应协和会组织之发达，以协和会工作为主流而行之，行政机关予以协助。”^②由此不难看出，协和会在控制、奴役广大群众方面的地位与作用。历史事实表明，在伪满后期，“国民邻保组织”是日伪把广大群众沦为战争奴隶和进行战时掠夺的重要工具，诸如征“国兵”，派劳工，物资配给，征收捐税，强制储蓄，收缴金属等，无不通过邻保组织进行。

协和会控制、奴役中国人民群众的所作所为，在人们心目中所引起的憎恶，与日俱增。所以，协和会活动的实际作用，由于受到普遍的抵制，而大打折扣，并非像协和会头头们所吹嘘的那样。尽管如此，作为伪满“国家团体”的协和会，随着政治、经济战时体制的实施，不断改组和加强。^③

“日满一如”与民族同化

伪满后半期，日本侵略者的口号，由“日满一德一心”升级为“日满一如”。“日满一如”也就是“日满一体化”。对此，“满洲国通信社”的解释直言不讳：“名目上有国家之别，实质上是一个国家”。^④此种解释表明，在“七七”事变后的战争状态下，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彻底兼并伪满洲国的过程，并把它公开化了。

① “要纲”要领项内的规定。

② 《国民邻保组织确立要纲》，1942年4月3日，国务院训令第24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8卷，“伪满傀儡政权”，第528～529页。

③ 1937年7月，设置总管会务的中央本部，1938年设企划局，由中央本部长直辖；1941年8月，实行伪满政府与协和会的二位一体体制。

④ 伪满洲国通信社：《满洲国现势》，1938年，第14页。

30年代以来，日本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七七”事变后，又过渡到完全的战时经济体制。日本的殖民地伪满洲国，也亦步亦趋转上战时经济轨道。近卫内阁和临时议会所提出的财经三原则，即生产力扩充、物资供需的调节和国际收支的均衡，和随之而实施之临时资金调节法、关于输出入货物措施法、外汇管理法等，都是把伪满洲国包含在内的。所以，“日满一如”或“日满一体化”，首先体现在经济方面。伪满洲国之所以从1937年起推行产业五年计划，首要的就是应日本之要求向日本军需重工业提供资源产品。而且，从1938年起，在计划的执行上，伪满洲国的供需安排，主要以日本战时经济计划即物动计划为准，伪满自身的产业五年计划已不具有强硬的指令性质。与此同时，伪满适应日本战时经济需要，大幅度地调整了经济统制政策，把“拥有五亿大众资本”的大搞军事工业的新兴财阀资本集团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引进东北，变为伪满洲国法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被视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日满一如”的明显体现。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也是以“日满一体化”为前提的。因为，伪满“国币”早与日元等价，伪满事实上已被纳入日元流通领域，伪满的市场已成为日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所以，当日本加强外汇管理时，伪满亦必须随之强化管理。伪满的金融、货物和证券流通，都是以日本大藏省的法令为准据的。在外贸、关税和资金等方面，伪满应日本战时经济、特别是扩大军工生产之需，而加以调整和改动。例如，自1938年1月1日起，伪满全面实行新关税法，修改并统一了关税，以适应日本的战时贸易关系。

经济的“日满一如”和政治的“日满一体化”，互为因果，相辅相承。1936年开始准备，1937年实行的治外法权废除和满铁附属地行政权的转让，如本书有关章节所述，绝非是日本放弃了

特殊权益，而是把特权和利益扩及到伪满洲国的全域。日本帝国主义在全面控制了伪满政权，并建立起法西斯殖民统治之后，继续保留治外法权，不啻为作茧自缚。所以，在满洲重工业公社成立、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开始执行，也就是经济的“日满一如”采取重大步骤的同时，政治上撤销治外法权，并非偶合。在1937年12月的当时，日本的侵华战争已全面开花。在这种局面下，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迫不及待地，从各方面推进“日满一如”或“日满一体化”，以支撑其不义的侵略战争。所以，“日满一如”，不单体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军事上也同样如此。“七七”事变后，关东军是首批侵华的急先锋，关东军东条兵团还很快进犯察绥地区。与此同时，伪满军也一批批地被送上侵华战场。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推行“日满一如”，把伪满变成它的构成部分，以弥补其侵略力量之不足。

日本帝国主义要实现“日满一如”，还必须解决所谓“满鲜”关系问题。因为，在地理上伪满与日本之间介在着朝鲜半岛；在民族方面，百万计的朝鲜族是伪满的重要民族之一。虽然早在1910年日本已“合并”朝鲜，但朝鲜毕竟仍与伪满接壤，尽管朝鲜族名义上被视为“本质上”的日本人，可是实际上日本仍把他们作为“半岛人”，实行种族差别政策。1937年以来，日本在提出“日满一如”的同时，也提出了“鲜满一如”。他们或又解释称：“日满一如”，实即“日鲜满一如”或“日鲜满一体化”。

1937年4月20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正式访朝，会见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朝鲜总督南次郎和驻朝日军司令官小矶国昭。“满鲜一如”即出自此时。是时，伪满产业五年计划业已拍板定案，着手执行；朝鲜也开始实行根据产业调查会调查结果所确定的经济方针。1937年4月，日本阁议还曾决定，在组成中央

经济会议的同时，组成满鲜经济会议。该会议不限于“满”和“鲜”，还包含华北，以作为编制日满综合计划的中央经济会议的“前提会议”。该会议虽然因“七七”事变而延期召开，但是侵略战争更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推行“鲜满一如”。其具体体现就是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上架桥。按1936年12月10日伪满与日本签定的《协议书》，将在鸭绿江上架8座桥，在图们江上架6座桥，并设立满鲜鸭绿江共同技术委员会，开发管理鸭绿江的水运事业。此外，配合伪满产业五年计划，在鸭绿江上还要修建水丰发电站。^①至于包括清津、罗津、雄基等北鲜三港在内的北朝鲜铁路交通体系，早自1933年即已在“委托经营”名义下，由满铁统一经营。由于“满鲜一如”政策的实施，伪满与朝鲜在经济上已无疆界可言，至少同朝鲜北部是如此。但这不是为了便于“满鲜”的交流，完全是从统一掠夺“满鲜”经济出发。

“满鲜一如”的另一体现是：随着治外法权的废除，在百万朝鲜族正式变为伪满成员的同时，大量朝鲜族官员进入伪满政府。1937年7月，伪满行政改革时即有朝鲜族高级官员，简任官4名，荐任官21名，带着所谓“奠定鲜满一如基础的任务”，踏进伪满官衙，取得“枢要职位”。及至1937年12月治外法权废除时，又有原属朝鲜总督府的2127名官员成为伪满政权的“细胞”，而“力行鲜满一如之实”。^②日本帝国主义是把“在满朝鲜人”当

^① 鸭绿江架桥点是：昌城、碧潼、楚山、慈城江口、临江、厚昌江口、新芝坡镇、长白；图们江架桥点是：庆源、庆兴、稳城、会宁、茂山、三长。架桥费共为670.5万元，“满鲜”折半负担。伪满负责在两江上各架4座桥。

1937年8月20日，日本与伪满签定了鸭绿江、图们江两江发电事业备忘录。据此，日本方面成立朝鲜鸭绿江水力发电株式会社；伪满方面成立满洲鸭绿江水力发电株式会社，两社共同担当两江水电事业的开发。当时计划在鸭绿江上即修筑7座电站。

^② 《满洲国现势》，1938年，第15页。

作伪满的“重要”构成份子来对待的，并且首先“培养把握其核心的指导阶级”。①因此，向伪满政府大量安插朝鲜族官员，既是加强控制朝鲜族群众的需要，也是图谋发挥朝鲜族对伪满政权的“重要”作用。

“鲜满一如”是朝鲜第七任总督日本陆军大将南次郎提出来的，同这一政策口号一并提出来的还有所谓“日鲜一体”。前者，实质就是把对朝鲜的直接统治延长到伪满洲国，即所谓的“朝鲜延长主义”，取消“鲜满”的实际国境线；后者，便是妄图使朝鲜族彻底“日本人化”，也就是所谓的“皇民化”。可是，它不意味着朝鲜族地位的提高，而只是欲使“半岛人改变成忠良的皇国臣民”②，以供驱使。“皇民化”运动，不但推行于朝鲜，而且也施之于“在满朝鲜人”。此种政策，可溯源至1910年“日韩合并”，那时已成既定国策。“七七”事变后，为使朝鲜族报效“圣战”，而紧锣密鼓，变本加厉。“皇民化”先从学校做起，在语言上下手。1938年3月，朝鲜总督府发布新教育令，将朝鲜语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翌年朝鲜语课完全取消，实行日语常用化，教材和授课全部改用日语。伪满洲国则步朝鲜之后尘，1941年1月17日伪满民生部特发布文件规定，朝鲜族中学一律使用日本内地及朝鲜总督府指定的教科书。在思想舆论方面，1940年8月，朝鲜总督府竟勒令朝鲜《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停止发行，该二报纸，历史悠久，在伪满洲国内的朝鲜族中广为流传。众所周知，进入40年代，在伪满洲国刮起拜神诵“经”之风，人民群众被迫“参拜”日本神社，大念“国民训”等等。而在朝鲜人

① 关东军司令部：《在满朝鲜人指导要领》，1938年7月25日。〔日〕《现代史资料》，11·续满洲事变》，みすず書房，第956頁。

② 南次郎：《在道知事会议上的总督训示》，1939年5月29日。

中间，早在1937年7月就开始背诵《皇国臣民之词》（对小学生）和《皇国臣民誓词》（对中学以上）。关于“皇民化教育”，宣染最甚的是皇权神化，它与伪满普遍推行的“唯神之道”是一脉相承的。不过，“皇民化”运动使朝鲜族蒙受奇耻大辱的，莫过于换姓改名。1939年10月10日朝鲜总督府公然颁布《改正朝鲜民事令》，强令朝鲜族一律改为日本姓名，拒改者视为“非国民”，不发居民证，不配给粮食，不能就业，不许入学。“在满朝鲜人”也不例外。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干的目的在于，迫使朝鲜族充当炮灰和战争奴隶。1938年日本即发布了《陆军特别志愿兵令》，采取志愿兵形式用朝鲜族作为日军补充兵源。后来，不但对朝鲜族正式实行征兵制，而且实行“国民义务军制”，适龄青年全被编入国民义务军，接受军事训练，准备上战场。接“征用制”所征集的青年，则被送到军事工程和矿山服劳役。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妇女，被迫编成“妇女挺身队”，充当“慰安妇”，供日军发泄兽欲，遭受血肉蹂躏，最后有大量朝鲜姐妹含恨而死于异国他乡。

在伪满后半期，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把内蒙地区作为西进、外侵的战略要地，继续利用蒙古族的剽悍性格作为武力镇压和军事侵略的工具。而且，不是一般的继续，而是更加变本加厉了。因此，日伪的蒙族政策一仍其旧。同时，蒙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民族意识遭受日伪奴化政策的严重摧残。不过，蒙旗特殊行政制度却发生重大变化。如本书第十三章所述，随着开放蒙地和锦热蒙地的所谓“上交”，县旗并存的双层行政制被取消。这是对蒙族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需要，也是强化财政经济掠夺的需要。在蒙地“上交”时，伪满的大规模“地籍整理”已经开始。后来所实行的新地税法和掠夺农产品的“粮谷出荷”，都是以“地籍整

理”的结果为依据的。当然，对于蒙旗地区，特别是伪兴安四省地区，伪满主要征收家畜税，其次才是土地税。蒙地，土地贫瘠，耕种粗放，实行休耕，故土地税不按耕地面积，而按耕犁征收，称为“犁捐”。此捐对蒙族以外的民族征收尤重，但主要税种家畜税还是落在蒙族头上。

盐对于以游牧为生的蒙旗地区人民至关重要。日伪当局通过专卖，贱买贵卖，盘剥蒙族人民。著名的达布苏诺尔的盐是湖盐^①，蒙族人民夏季采盐，冬季越兴安岭出售，换取粮食和生活用品。“九一八”事变前，一车盐可换一车粮食。伪满洲国成立后，按专卖法规，卖盐必须卖给专卖机关，所得价款，三车盐才能换一车粮食。当进入达布苏诺尔盐的运输季节，伪警察在道路上设卡拦截，林西专卖局收盐时又故意刁难，以致售盐蒙族群众需等三四天才能售完，结果售盐价款消耗大半。蒙旗地区的毛皮收购，也为“国策会社”满洲畜产会社所垄断，价格是指定的。可是，蒙族人民购买工业品和生活用品却必须支付高价，遭受多层经济掠夺。

日伪当局用盘剥蒙族群众的一部分收入，豢养蒙族伪军伪警。而蒙族武装力量，不但被用于对内的武力“讨伐”和镇压，而且还被驱使进行外侵。为此，日本侵略者竟然宣扬蒙古人与日本人种相近，性格一致。更有甚者，还异想天开，妄图制造共同的祖先。举世周知，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受到蒙古民族的衷心尊敬。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利用此种心理蒙蔽蒙古民族。“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准备军事侵华时，就出现过“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的奇

^① 属察哈尔锡林郭勒盟，介于西乌珠穆沁旗和东浩济特旗之间，周围17公里，是蒙古第一盐湖，年产2500万斤盐。

谈怪论，可它却受到日本御用学者的赏识。源义经本是日本古代史上一位失败的亡命英雄。传说称，他败兵后辗转逃到中国蒙古地区，当上成吉思汗。更有甚者，竟说爱新觉罗也是源氏的后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又老调重弹。多年从事蒙古谋略活动和操纵伪蒙军的关东军特务金川耕作，还以此种荒诞的传说为舆论，在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下，到处游说，百般搜刮，积极建造成吉思汗庙，并在王爷庙设立了以伪兴安局总裁巴特玛拉布坦为委员长的奉建委员会。蒙族群众崇拜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天经地义，无可非议；成吉思汗庙实际上也是由蒙族群众用血汗，双手奉建。问题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居心叵测，他们妄图通过伪造历史，借诸偶像，愚弄蒙族群众。不过，在利用神灵奴化东北人民方面，这只不过是一个局部或侧面。

改祖换宗的“惟神之道”

从精神方面看，1940年溥仪第二次访日，捧回日本天照大神，开始推行“惟神之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的殖民统治，转入令人更加无法忍受的新阶段。

溥仪从第一次访日到第二次访日的五年间，主观思想和客观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前所述，日本帝国主义所导演的溥仪第一次访日，可算是相当成功。当时的溥仪真是昏昏然了，甚而感到自己当真与裕仁天皇平等了。然而，随后发生的凌升事件和护军事件，不能不使溥仪心灰意冷，灾祸莫测。除此之外，日本帝国主义在溥仪的帝位继承问题上大作文章，也在煎熬着溥仪的神经。溥仪第一次访日后，在一片“日满一德一心”声中，溥仪的周围，诸如皇弟溥杰、皇后弟润麒、皇妹夫郑赜鼓等，都被

送往日本，接受“熏陶”。就像对待护军那样，溥仪对他们寄以厚望，日后建立起自己的势力。然而，溥杰学成回归后却被伪军政部派了差，溥仪无权无法过问。不仅如此，溥杰还被日本帝国主义选为伪满帝国改换皇室血统的理想对象。1937年3月1日，溥仪登极三周年之际，伪满洲国突然抛出一项大法《帝位继承法》。1个月零3天后，4月3日，皇弟溥杰宣布与日本女子嵯峨浩结婚。浩是日本贵族侯爵嵯峨实任之女，同明治天皇有血缘关系。在溥杰与唐怡莹刚刚离婚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便不失时机地撮成这桩婚事，其政治企图是昭然若揭的。尽管后来溥杰与浩恩爱相处，夫妻美满，但是不能因此而抹煞日本帝国主义的卑劣用心。无论如何，溥杰与浩的结合，是侵略者导演的政治婚姻。溥杰深刻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真正企图是“想抄袭日寇对李垠——朝鲜的前国王的老法子，想偷梁换柱地把所扶植起来的汉奸伪帝进一步换成为中日混血儿的伪帝”。^①溥杰还说，在他结婚前公布的《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皇帝之子或孙继承皇位；无子或孙时，可由皇帝的侄子继承。^②“侄子指谁而言？不用说，当然是指着我及我的日本妻子的混血结晶”。^③正是因为包藏着如此重大的政治祸心，在颁布《帝位继承法》的文告中，利用溥仪之口气强调：“所有守国之远图，经邦之长策，悉与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益敦两国不可分离之关系”，还说定此大法也是“日本天皇陛下保祐是赖”。^④然而，不管日本帝国

① 1951年9月24日溥杰揭发吉冈安置材料。中央档案馆，119—1，503。

② 此为第五条规定。第九条还规定，“帝嗣精神或身体如有不治重患或有重大事故时，得经咨询参议府，依前数条更易继承之次序。”

③ 1951年9月24日溥杰揭发吉冈安置材料。中央档案馆，119—1，503。

④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8卷，“伪满傀儡政权”，第159页。

主义多么急于向爱新觉罗皇族注入日本血统，但是生儿育女的自然规律却不受人们的主观来摆布的。①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妄图改易爱新觉罗的血统，而且还意欲变换中国人民的“祖宗”，为伪满洲国最后划归日本，做政治、思想和舆论上的铺垫。这本是日本帝国主义最高国策和终极目的，但是侵略战争所酿成的日趋紧张的形势，加速了它的步伐。为了把殖民地的人、财、物力全部赌在侵略战争上，日本侵略者开始借助于神灵，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实行亡种灭族政策了。

关东军向溥仪提出统一“日满”精神信仰，将日本天照大神捧到伪满洲国，当作“国民”的“祖先”来供奉，是发生在1940年的事情。据说，如果不是先后发生焦头烂额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或许还会早些。至于此类主张则早已出现。1934年2月，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发表的大井二郎《对满文化政策的新目标》就提出，日本对伪满不能采取“功利万能主义”，而要“把握满洲国人”，“尽早制定国教，并掀起灌输国教精神与生命的运动。”②时至1940年，就连当年与肃亲王沆瀣一气发动“满蒙独立”叛乱的川岛浪速都不甘寂寞了。年逾八旬、双耳失闻，地地道行将就木的糟烂老头子，竟然来到伪满洲国，调查神灵。川岛一伙在吉林小白山，硬说庙中的祭器、执事等与日本的“素盏鸣尊”，亦即天照大神儿子所用的东西相似。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史书说，日本远古的史前时期，有个神代，始祖是天照大神，他降临于大八洲荒岛，令神将武尊征服了各部落的凶神，建立了苇原瑞穗国，即如今的日本国。还说：

① 1938年2月26日嵯峨浩生女儿出生。

② [日]《文那》，第25卷4号。

天照大神以三种神器治国，代代相传，从神代到人代，“万世一系”，“垂于无穷”。三种神器是：天丛云剑、八咫镜、八坂琼曲玉。说它们象征“智”、“仁”、“勇”，是日本传统的治国“法宝”。

把日本开国元神天照大神接过来，也作为伪满洲国建国元神的决定，是因诺门坎战争吃败仗而行将卸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通知溥仪的。具体策划者和实行者是：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置和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实际的中心人物则是关东军第四课长片仓衷，他奉军部之命，从1938年秋起就向伪满汉奸活动，极力鼓吹制造一个“国民”崇拜的目标，提出“天、地、人”三体之神。他们向溥仪宣称，日本历代天皇都是天照大神的神裔，即“现人神”，既然溥仪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宗教信仰也应该同日本完全一致。是时的溥仪虽然不能说是死心踏地，但已事事顺从日方了。然而，居然被迫改易祖宗，其内心之苦楚，可想而知。可他只能是偷偷告祭一番自己的祖宗灵位，便乖乖地按日本人的摆布行事了。

1940年是日本纪元2600年，日本帝国主义抓住这一时机推行其既定计划。同年6月22日，溥仪为期8天的第二次访日的政治傀儡戏拉开了帷幕。剧情比较简单：溥仪在吉冈安置的导演下，向裕仁天皇表示欲迎接天照大神到伪满洲国奉祀，裕仁表示同意，并把业已准备好的代表天照大神的3件“神器”——剑、铜镜和勾玉，交给溥仪捧回。溥仪回到伪都新京后，将象征天照大神的3件“神器”供奉在特在伪宫内赶忙修造的木制“建国神庙”之内。7月15日，按“政祭合一”的原则，对所谓的“建国元神”——天照大神，进行“国祭”规格的“开光”大祭。同日，溥仪还颁布了实际由伪国务院嘱托佐藤草拟的《国本奠定诏

书》^①和《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祭祀令》。同时，还修改了伪满洲国的《组织法》，设立直属于伪帝的祭祀府。而祭祀府总裁则由原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宪兵团司令官、现任伪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担任，伪参议沈瑞麟任副总裁。

国本奠定诏书

朕兹为敬立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日兴，蒸蒸日跻隆治。仰厥渊源，念斯不绩，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祐。是以朕响躬访日本皇室，诚悃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教，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祇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庥。尔众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②

伪满14年间，溥仪6次颁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标志着日本迫使伪满洲国附庸化和彻底奴化东北人民精神方面，又有重大升级。“诏书”中的关键性语言是：“国本奠于惟神之道”。为了推行这一“惟神之道”，“诏书”颁布20天后，伪民生部特以部令通告：“皇帝陛下于帝国创立建国神庙，圣躬钦奉

① 溥仪颁布的诏书，均先由伪总务长官、关东军第四课长拟定大纲，交由伪国务院嘱托佐藤知恭草拟，最后由关东军司令官批准。

② 伪满洲国《政府公报》，1940年7月15日。

祀建国元神天照大神”，从而正式宣布将日本的开国元神奉为伪满的“建国元神”。①翌年，1941年7月15日，溥仪亲自参加所谓建国神庙的首次“元神祭”。大祭后未及半载，太平洋战争爆发。于是，天照大神的神灵便成了驱使和奴役东北人民“献身大东亚圣战”的强制力量，因而“惟神之道”的推行，与侵略战争同拍节，愈演愈烈。后来，日伪决定在伪都新京郊区之净月潭划占大片土地，准备修造规模宏大的建国神庙；还通令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迎接天照大神的牌位，进行供奉。更有甚者，伪满还以法令强迫中国人民崇拜日本元神，否则治罪。②

“新学制”——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的教育领域，从未忽视。而且他们还发现，法西斯德国之所以能够迅速重新武装，苏联为何得以抗击德国的强大进攻，归根结底全都是“经过相当年月默默经营实践”教育的结果。③本书前面业已谈及，日本在伪满推行的基本教育方针是：培养丧尽民族意识，“体得建国精神”，对傀儡政权怀有“国家观念”的“忠良国民”，即殖民地奴才。所以，伪满洲国出笼伊始，日伪便夺取教育大权，并采取一系列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与措施。但因伪满前半期集中实行“治安第一主义”，施政重点是建立殖民统治，加以改易教育制度又非一朝一夕之事，

① 1940年8月6日《关于国本奠定诏书圣旨奉体之件》，伪民生部令第126号。

② 1942年7月15日以敕令第184号公布《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处罚法》。例如，伪铁岭市长徐渐九在某次会议闲谈中说，修建建国神庙无非是老张皇祖宗硬要老李家也供奉，为日本人所闻知，结果被捕判刑。

③ 伪满文教部教学司长佐枝常一，《教学之振兴》。《满洲国政指导概览》，1944年版，第265页。

所以日伪对原有的教育体制采取“一半因袭，一半破坏”，对原有教育队伍实行“一部分屠杀，一部分收买利用”的策略。

随着行政体制的改组和战时经济体制的实行，彻底破坏原有教育制度的大手术终于开始。1937年5月2日发布，1938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所谓“新学制”，其核心就是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决定《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中所规定的“劳作教育”和“实业教育”。也就是，让人们“只知劳动，不懂学问”，而“劳动”不为自己，是对日伪“尽忠”，“奉仕”。具体而言，“新学制”将学校体系分为“三阶段二部门”。“三阶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二部门”是：师道教育、职业教育。所有这些教育全都以实务教育，也就是劳务教育为中心，都要实行“精神训练”、“劳作教育”和“体育炼成”。至于“新学制”的具体内容，伪满政府公布了11项要点，其中要害和本质为如下的（一）（五）（六）（七）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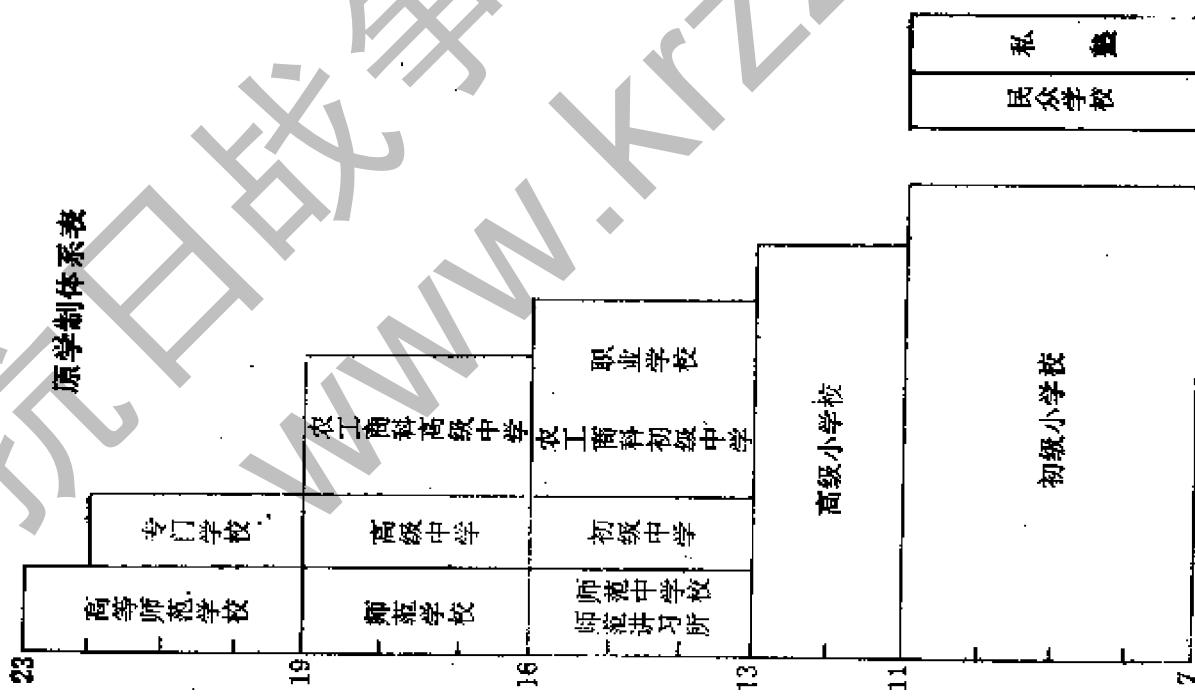
- （一）“修业年限尽量缩短”；
- （五）“教育内容一般均以实业科目为重点”；
- （六）“基于日满一德一心之精神，日本语作为国语之一而予以重视”；
- （七）“道德教育，特别是以国民精神为基础的精神教育须在一切学科中，普遍实行”。①

所有这些都始终如一地贯彻在各级各类教育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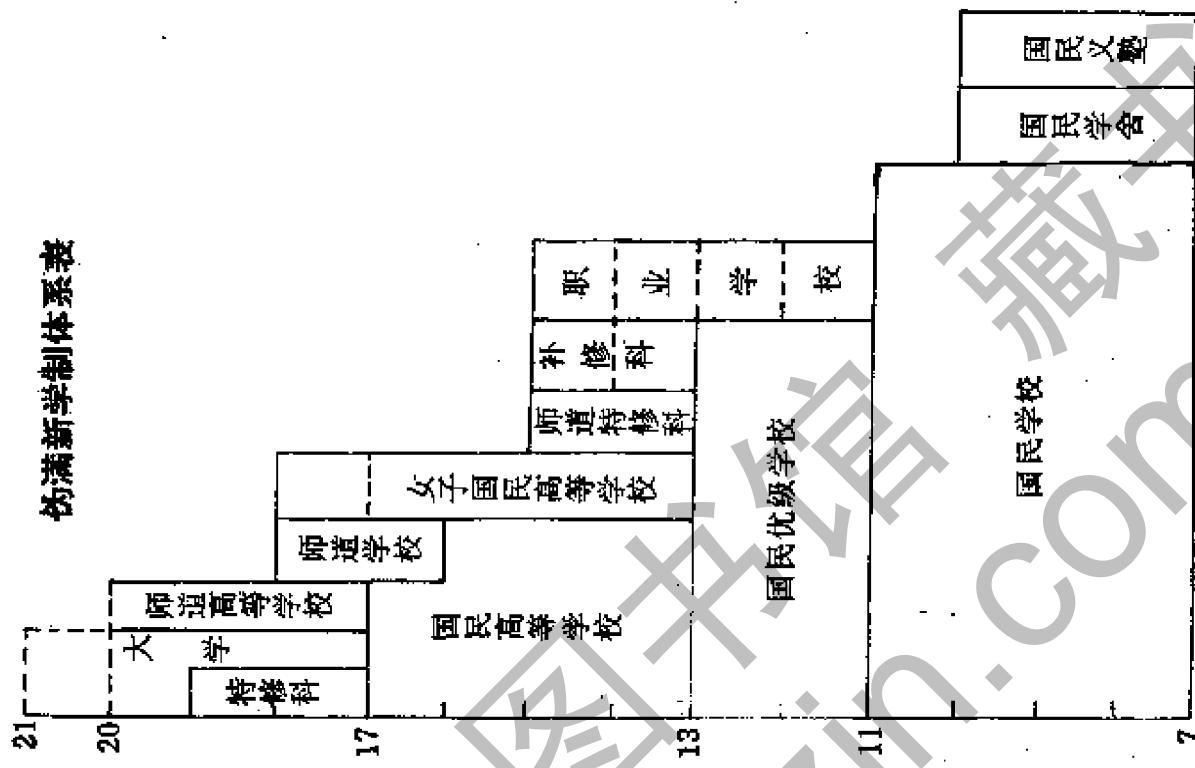
少年儿童，天真烂漫，思想可塑性极强。所以，日伪奴化教育是从初等教育就做起的。“新学制”的初等教育，包含国民学舍、国民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中心环节是相当于原来初级小学

① 伪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新学制之大要》，1937年。

原学制体系表



伪满新学制体系表



的国民学校，它主要设于县、旗、街、村，或相当于街、村的地方。国民学校的教育目的，是把儿童培养为所谓“忠良国民”。为此而向他们“授以国民日常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① 就数量而言，日伪需要最多的便是此类“有劳动习性”和略备知识的所谓“新国民”以推行其侵略掠夺政策。因而，如果说伪满时期教育还有一定发展的话，那主要表现在初等教育中的此类国民学校上。^② 然而，在伪满洲国，就是此类初级小学也不是义务教育。人民群众极端贫困，儿童就学率只是40%左右，中途退学率则高达50%。偏僻地区，国民学校也无条件设立，“代用”设施，称为国民学舍和国民义舍，前者是公立，后者是私立。都是因袭原有极端简陋的教育设施，修业1~3年，绝大部分采取“单级复式制”，不同年级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日伪竭力将奴化教育贯彻到穷乡僻壤，按所谓“渐进主义”方针，逐步把私立国民义舍及私塾改为公立国民学舍，并对学舍进行监督。日伪惟恐学舍、义舍以及私塾化为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宣传讲台。

日伪为奴化人民，非但遏制高等教育，而且对中等教育也进行控制。所以，在伪满“能够进入中等学校者在国民中不过是极少数。”^③ 可是，初级小学——国民学校的毕业生过于年幼，难以直接充作劳动力。于是，日伪特别在初级小学——国民学校和中学——国民高等学校之间，设立中间过渡阶段的国民优级学校。学制上，它虽然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小学，但是教育目的迥然不同，

① 《国民学校令》第一条，1937年5月2日，敕令第69号。

② 据统计，1932~1942年，国民学校学生增加4倍，达220万人，为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③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新学制之大要》，1937年。

主要进行“实务”教育。

“新学制”之“尽量缩短修业年限”主要推行于中等教育，“实务教育”在中等学校也贯彻得更为突出。伪满前半期，中等教育尚因袭原有的“三三”制，即初中3年，高中3年，并以文理教育为主。日伪为把中等学校作为培养所谓“忠良之中坚国民”的场所，变“三三”制为初高中合一的四年一贯制，并主要实行实业和实务教育。为此而制造的理由是所谓“防止学问游民辈出”。40年代初，伪满当局曾宣称，中学生人数倍增，但如考虑人口的增长，及其对初等教育的比例，则其绝对数量和增幅幅度都是极其有限的。^① 日伪将绝大部分青年学生拒之于中学的大门之外，目的之一是把少数中学生培养成为其效忠的骨干，此种企图体现在中等教育的各个侧面：（一）在国民高等学校，列为“精神教育”首位课程的“建国精神”，4年间始终占十分之一课时。（二）被作为伪满“国语”的日语课，始终为“满语”（即汉语）或蒙语课时的一倍。（三）实务课程占全部课时的四分之一以上。课程内容极为广泛，以农科为例，科目达20多个，如：农作物、园艺、土壤、肥料、土地改良、农作物病虫害、畜产、畜产品加工制造、兽医、家畜卫生、牧草及其它饲料、牧场经营、柞蚕、育苗、造林、森林保护、森林利用、森林数学、森林经营、农林土木、农业气象、测量、产业组合，等等。（四）作为军训和体训课程的“教练”和“体练”占有重要地位。（五）授课日数，全年为180天，而所谓“终日实习”、“终日教练与体练”和所谓“勤劳奉仕”等，即使按规定的最低标准60天计

^① 满洲日日新闻社：《满洲年鉴》，1944年载，1942年公私立国民高等学校在校生为74219人，为当时人口的1.9%，是高小学生的五分之一，是初小学生（国民学校）的三十分之一。

算，也相当于授课总日数的三分之一。如再加上授课中实务、教练、体练等课的时数，不难想见，伪满时期的中学生究竟学到多少科学知识，而却遭到何等程度的残酷奴役？！

师道教育和职业教育，如前所述，在“新学制”中，称为“二部门”教育。它们属于中学范畴，也有少部分属于高等学校范畴。师道即师范，此类教育设施，主要培养符合日伪要求的各级教师，并对原有教师进行“再训练”。至于职业教育，日伪认为，原有职业教育落后，学生不多，故特作为单独的教育部门。但是，此种教育未得发展。因为，各大型工厂企业迫于需要都自办了应急的培训机构。

日本帝国主义从来不愿殖民地人民掌握科学技术，故对高等教育一贯采取遏制政策。推行“新学制”时，对高等学校的学制、设置与发展，无任何规定与计划。后来，由于日甚一日的战时经济掠夺，对劳动力和技术提出了迫切要求，才从战时经济矛盾开始暴露的1939年前后，增设若干高等学校。先是1938年，奉天高等农业学校、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和新京医科学校、私立哈尔滨医科专门学校、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等改为大学。1939年，又有日俄协会的哈尔滨学院改为“国立大学”哈尔滨学院，伪司法部法学校升格为新京法政大学。同年，私立哈尔滨医科大学改为“国立”，新京和奉天两个矿工技术院分别改为新京工业大学和奉天工业大学。增设的高等学校，大多与农业资源掠夺和农业移民掠夺密切相关。1940年，设立新京畜产兽医大学、哈尔滨农业大学和佳木斯医科大学；1941年又匆忙设立修业年限短于一般高等学校的齐齐哈尔、龙井、哈尔滨3所开拓医学院。同年，私立奉天药剂师养成所改为“国立”，附属于新京医科大学。这样，高等学校从1937年的10所，增加到1942年的20所，教职员从248

人增加到814人，学生则从2200人增加到大约7000人。^①各项指标虽然都是成倍和数倍的跃增，但与人口相比，只为万分之1.5。况且，多数学校系临时升格，新设学校都是基于“国策”需要，属于应急对策。其水平可想而知。就学科而言，农、工、医科居多，并与中学相同，也实行实务教育。

建国大学与大同学院

与一般高等学校形成鲜明的反差，在伪满有两所被称为特殊教育的设施，即建国大学和大同学院，它们一枝独秀，格外受到日伪的垂青，占有特殊地位。因为他们是培养殖民统治的核心骨干人员的场所。

建国大学亦可视为“新学制”的产物。1937年“新学制”公布后，同年8月5日伪满政府颁布《建国大学令》。而筹备活动始于同年初。当时关东军参谋辻政信提议：在伪都新京创办一所容纳亚洲各民族的培养亲日枢要人才的综合大学。辻政信是大亚细亚主义者石原莞尔的学生，其提议的实质，就是图谋以大亚细亚主义——日本为盟主的亚洲人抗斗欧美人和进行反共的思想，教育包括白俄在内的亚洲各民族。此种主张隐现在《建国大学创设要纲》之中。^②“要纲”说，建国大学是“独创的大学，超越一切现有概念，既深且广地通晓亚洲的现况与未来”，“要纲”特别强调所谓“高远的理想”和“长久的理想”，“理想”意味什么，不言而喻。为创办这所特殊大学，特设立以关东军参谋长东

^① 日伪资料中关于大专学校的统计极为混乱，原因是许多都是似是而非的大专学校，故统计标准不一。

^② “要纲”公布于1937年8月5日伪满《政府公报》。

条英机和伪满总务长官星野直树为头头的创办委员会。具体筹划与实行，则是关东军第四课和伪满国务院总务厅。计划极为庞大：拟占地200万坪^①，修建堪称亚洲一流的图书馆和可供大规模训练的宏大教练场，投资700万元，修建一个现代化建筑群，其中包括一所所谓的建国研究院。计划落实时，虽然规模压缩到原来计划的三分之一，即占地60万坪，但是也大于一般大学10~15倍。

1938年5月2日建国大学正式开学。根据前此公布的《建国大学学则》和《建国大学令》，它不隶属于文教部门，而由伪满国务总理直辖，大学的总长亦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兼任。按“次长制”，副总长自当是日本人，它才是大学的真正主宰者。首任副总长是，原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主任·日本哲学、天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专家作田庄一，其继任者则是因制造张鼓峰事件而臭名昭著，并曾任日本陆军教育总监的日本军阀尾高龟藏中将。自1939年起，建国大学还设有伪满国务总理大臣任会长，总务长官、建国大学副总长、伪民生部长和协和会中央本部长必然参加的参议会。协和会中央本部长三宅光治亦曾试图以协和会之力承办关东军设计的建国大学，后因经费问题而未逞。尽管如此，协和会也担任建国大学的政治思想领导，它处于协管地位。建国大学是伪满国务院直属机关，但校内设有协和会组织，包括效仿希特勒青年团的协和青年团。

建国大学的教授队伍中，有的竟享受伪满“特任官”待遇，且几乎清一色是日本人，中国教授只鳞片爪。^② 被聘为建国大学

① 1坪等于3.30582平方米。

② 据1941年《建国大学要览》载，35名教授中只有8名中国教授，42名副教授中只有2名中国人。

顾问、名誉教授和讲师者，不但有法西斯御用学者，还有关东军的高级军官、伪满高级官吏和特殊会社的高级职员。

建国大学学生全部免费学习，这在伪满高等学校是独一无二的。日伪不惜重金，完全是为了培养殖民地统治的核心骨干人员，也就是所谓“体得建国精神之神髓……之先觉指导者。”^①因此之故，关东军和伪满政府共同确定了严格选拔建国大学学生的原则，招收一定数量的各民族学生，但每个民族学生都必须经过特定的专门考试，尤其注重思想和政治情况。实际上，凡是跨入建国大学之门的学生，都经受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的暗中审查，特别对白俄学生更为严格^②。建国大学副总长作田庄一曾称：不管是日、满、鲜、俄、蒙、台、汉任何民族学生，除对“日满”外，不得有任何祖国观念，以使学生最终能按日本的意愿去指导“满洲”以至亚洲各民族。建国大学明文规定，学生毕业后负有义务，接受伪满政府的分配，充当伪满政府官吏和协和会职员。^③学生入学后还须提出“在学誓书”和保证人。

建国大学所标榜的“教育特色”是“知行合一”，培养“实践人材”，教授团“实行共同研究”，“教授与学生一体”，“理论与实践统一”，“本着信念运用手腕”。简言之，就是培养立即有能力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实干人员。因此，建国大学的学制非同一般：一是修业年限为一般高等学校的1倍，共6年；二是分为教育训练重点不同的前期和后期。前期三年主要是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军事训练占近40%。日语、汉语均为第一语学，是课时最多的必修课和主课，

① 1937年8月5日《建国大学令》，第1条规定。

② 由毕业学校报白俄事务局和哈尔滨特务机关，经关东军第二课审查后，第四课指导总务厅挑选。

③ 1937年8月5日《建国大学令》，第22条之规定。

后期三年以学科为主，除共同的基础学科外，分政治、经济、文教三大学科。每学科分若干类，各类设有数门课程。后期的训练课，将作业训练分为农事训练和操作训练，前者包括农耕作业、蔬菜栽培、畜产、农产品加工；后者含有汽车驾驶、滑翔机操纵、机械修理装配，等等。军事训练也升格到以步兵大队为基干的诸兵种联合作战训练。

建国大学后期三年，之所以分学科进行训练，目的在于，培养适于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方面推行殖民侵略政策的骨干人员。而贯彻在各个方面的，是军事法西斯教育和日本国粹主义教育。建国大学内虽无反苏宣传，但有反共教育，特别在伪满加入德意日反共同盟之后，反共教育变本加厉。建国大学大讲特讲之“八纮一宇”，即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世界统一。他们的结论是，达此目的最佳盟友便是德国法西斯。至于建国大学在精神训练、精神讲话以及后期基础学科所讲授的“建国精神”，无非是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别的国家乃是“天命”，关东军悍然侵占我国东北是出于自卫，“满洲”与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日本是最优秀的民族，伪满洲国与日本不可分，等等。如前所述，伪满洲国是自1940年开始推行“惟神之道”的。可在建国大学，建立伊始就作为基础课程而讲授神道与皇道。灌输神道，即排斥其它信仰，训练人们为神服务，为神牺牲。而日本天皇就是现人神，或者说人神合一。

然而，客观现实和主观愿望是两回事。建国大学的一整套法西斯训练教育，对学生不无作用，日本侵略者也迫不及待地把建国大学的学生派上用场。但是，事实却使他们不能不看到，青年学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驯服的。所以，建国大学在加紧训练的同时，对学生的政治监督也日趋严酷。从1941年“一二三〇”事件

起，建国大学的学生多次被捕。它反证了中国青年学生的反抗与斗争。

建国大学还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前者招收建国大学毕业生和其他适合者，从事专门研究；后者，由建国大学、大同学院以及其他大学的教授，和伪满政府、协和会等科长以上人员充任研究员，在所谓“实现建国理想”的口号下，从事“满洲民族思想”、“满洲国策”、“神道”、“在亚洲的日本化中满洲的前卫作用”、“建国精神”、“日满合并之路”、“全体主义”、“反共产主义”课题的研究。可见，所谓特殊教育设施的建国大学，不但是训练殖民统治骨干的场所，也是炮制殖民侵略理论与政策的中心。

大同学院始建于伪满初期，实质上它是伪满高等官训练所，与建国大学性质不同。“七七”以后它的变化是，它兼而成为伪满中央一级各官吏训练所的统制机关。大同学院自身设有三部：第一部是日本学员，其中又分两种，一是在日本或伪满刚毕业的大学生，二是在伪满任现职日本官吏学员，修业年限均为半年；第二部为中国人现职官吏学员，修业年限为1年。1940年伪满开始实行文官考试制度。于是，大同学院便以高等文官考试合格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官吏为训练对象。与此同时，还设立了副县长、协和会事务局长、兴农合作社理事和特殊公社高级职员的研究训练制度，即第三部。是时的大同学院已被日伪称之为“国家中坚指导者之精神道场”，该“道场”实行“学科教育”和“训练”，同时强调“避免偏于理论，注重国家运营上所必须之事项。”^①所以，大同学院除进行各种严格训练外，还进行诸如“农村实

^① 《大同学院教育规程》，伪满《政府公报》，1940年5月14日。

态”之类的调查。授课者许多都是执掌伪满各方面大权的决策者和有力人物。而大同学院的毕业生则占据着伪满政府中央各部司长、首次长、厅长、市县旗长等各种要职。他们还通过“同窗会”和同期生的联系，形成了控制伪满许多部门的巨大势力。大同学院的毕业生，还有一批随日军侵入华北，华北伪政权和新民学院的骨干，许多都出身于大同学院。^①

大弘报处与文化统治

日伪推行奴化教育的基本手段，是教育统制。而统制是多方面的：教材统制、私立学校统制、人事组织统制、教育团体统制。总之，教育事业各个侧面全都置于日伪的直接控制和监督之下。与教育同属一个范畴言论文化事业，也是同样命运。战时言论文化的专制统治，日甚一日。

1937年行政改革时，原伪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改为弘报处。它全面统辖宣传与情报，还接管了原由伪外交部宣化司所从事的对外宣传业务。作为总务厅6个处之一的该弘报处，是时已成为伪满言论文化统治中枢，和宣传、情报的首脑机关。而成员清一色是日本人。首任弘报处长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法西斯军人。^② 1938年，弘报处的监理、宣传、情报3个科，改组为受参事官指挥的庶务、新闻、广播、电影、地方、宣化、编辑、图书、情报等9个班。1940年末，伪满行政机构再次

① 到1945年7月，大同学院共训练18期，包括短期讲习班，受训者约3000人，其中日本人约2000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约1000人。

② 堀内一雄，曾任第九师团参谋，1932年后历任伪东边道保安司令部顾问、伪奉天警备司令部附、伪第一军管区参谋长。

调整，伪中央各部门实行“少而精主义”，人员和权力转移地方，强化地方行政机构。然而，总务厅弘报处却扩大为所谓大弘报处。大就大在，它根据1940年11月19日火曜会决定的《中央地方行政事务合理化要纲》^①接管了三大权力和业务：原属伪治安部的关于电影、新闻、出版物的检查和伪交通部的关于广播、通讯的检查；伪民生部的关于文艺、美术、音乐、电影、唱片、图书等文化行政事务；原属外务局的对外宣传实施业务。

本书前已谈及，1936年在满洲弘报协会设立时，对新闻界已进行一次手术，当时称之为新闻通讯的第一次“整理”。在非同寻常的1937年，通讯、新闻又实行第二次“整理”。一方面将通讯事业独立，建立独立的通讯体制；另一方面将未加入弘报协会的报纸进行整顿，使之纳入协会的统制之下。1937年7月1日由弘报协会全额出资的株式会社满洲国通讯社正式成立。^②而报纸的第二次“整理”，却一直进行到1940年7月，这是一次对报界更加残酷的扫荡。通过收买、撤销、合并和新设，弱小的报纸被淘汰，日文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弘报协会加盟报纸增至29家，虽然还不是伪满报纸的全部，但其发行量已占全满报纸发行量的90%，全面控制新闻舆论的目的已经达到。^③当时的这种“整理”，是以大连、奉天、新京、哈尔滨为中心进行的。四大城市，只准许各保存弘报协会加盟的中、日文报纸各1种；其中奉天、哈尔滨还准许并存1种非加盟报纸。例如：在奉天，日文报纸除加盟之《满洲日日新闻》外，有非加盟之《奉天每日新闻》；

① 伪兴农部大臣官房：《兴农部关系重要政策要纲集》，1942年，第35~37页。

② 独立后的“国通社”，社长由弘报协会理事长森田久兼任，理事有：三浦义瓦、姚任、甘柏正彦等。

③ 森田久：《满洲新闻是如何统制的》，1940年8月10日。

中文报纸除加盟之《盛京时报》外，还有非加盟之《醒时报》。此即所谓的“四大据点主义”。其它地方一般只许1种报纸存在，其余都在扫荡之列。

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扩大的几乎同时，1941年1月16日满洲新闻协会取代满洲弘报协会。此举是为了建立所谓新体制，强化“处于第一线”的直接操纵舆论的新闻机关。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国际法西斯同盟业经建立，太平洋战争迫在眉睫。苏德战争爆发和所谓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开始后，伪满又公布了所谓“弘报三法”，即：（一）《满洲国通信社法》，据以国通社变为伪满特殊法人，它起着伪满弘报大动脉和轴心作用，垄断信报的搜集与供应^①；（二）《新闻法》，它规定报社的设立属于伪满政府的命令事项，报社理事长、理事和监事由政府任命，且政府得以对报社发布监督上和所谓公益上必要的命令，对报社进行严格统制；（三）《记者法》，它规定了记者的考试、惩戒和登记取消制度，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压制言论自由，保守战时机密，和迫使记者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服务。

“弘报三法”是1941年8月25日同时发布的，5个月后，1942年1月25日，国通社和《满洲日日新闻》（日文）《满洲新闻》（日文）《康德新闻》（中文）等四大通讯、新闻机关正式变为伪满特殊法人。与此同时，为实行所谓新闻新体制，在文化发达地区进一步废除重复报刊，在偏僻地区，创办新的地方报纸，以利“思想战”，按当时的所谓“国情”，“积极”指导现有报纸。于是，对报界的大扫荡再次开始。到1942年6月1日满洲新闻协会会员只剩10家，而在一年半前，即协会成立时尚存27家。

① 该法第6条规定：“对国内外新闻社或外国通信用社的信报供应事业，非满洲国通信社不得进行。”

在出版方面，前已提及，1937年3月29日，伪满发布法令，设立满洲国图书会社，以一个特殊会社垄断教科书的发行，编辑出版“国策优良图书”，并进口大量日本出版物。1939年12月，在日本书刊潮水般地涌人伪满的形势下，专营图书进出口业务的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成立，它是满洲图书会社的姊妹社。其实，该社主要是进口日本书刊。1936～1941年，日本进口图书从58万册增加到3400余万册。^① 日文进口书刊，绝大多数都是宣扬“王道”、“皇道”、侵略战争，以及与日本有关的出版物。伪满出版的书刊，也以日文占优势，中文出版物，严受统制，寥寥无几。1941年7月出版的137种书刊，日文112种，中文只有28种。有幸得以出版的中文书刊，无非都是有利于侵略战争宣传和诋毁民族文化者，至低亦系对殖民侵略政策无害者。伪满政府为进一步统制“国策出版事业”，1941年1月15日还设立了满洲出版协会，它是伪国务院总务厅指定团体，全面统制出版事业。

“满映”与“国策文艺”

1937年伪满文化领域的大事之一，是满洲映画协会的面世。它简称满映，垄断电影的摄制、输入和配给。和经济领域所实行的“一业一社主义”一样，它是统制电影事业的特殊会社。

伪满初期，日伪摄制的电影，主要是满铁电影班跟随关东军拍制之记录片，如《满蒙破邪行》、《江西扫匪》、《建国之春》、《结成协和》等等。而饱受关东军铁蹄之苦的东北人民对之极端厌恶。当时，占据电影市场的主要还是上海电影和进口洋

^① 《满洲帝国年鉴》，1944年版，第570～571页。

片。除满铁附属地外，日伪纪录片和日本电影放映量只占十分之一。日伪当局当然不会甘心于此，他们声称，备受群众欢迎和喜爱的关内影片，“反满抗日色彩浓厚”，“大部分违反国策”。1936年，伪国务院情报处即伙同关东军等日伪机关，策谋成立“大的国策映画会社”，以占领电影文化阵地。1937年8月2日，伪国务院会议通过设立满洲映画协会的法案，8月14日公布，同年10月7日又公布了《映画法》。前者是满映据以设立的特别立法，后者则给它以垄断电影事业的统制权。

满映，实质是伪满与满铁勾结的产物。后者在对华文化侵略上素有经验，颇具实力。不过，主体是伪国务院总务厅。设立委员长是总务厅次长神吉正一，弘报处长堀内一雄，此外，伪产业部次长岸信介也与谋其间。满映的理事长人选尤其令人瞩目，由日本浪人、特务和伪满首任警察头子——警务司长甘粕正彦担当，而且一直当到日本战败投降。联想到法西斯军人高柳保太郎担任满洲弘报协会理事长，堀内一雄充当弘报处长，满映头头如此安排，也不足为怪。

1937年8月21日满映正式成立，资本500万元，伪满政府与满铁各半。按计划，将于1939年7月建成电影制片厂，地点在伪都新京黄龙公园对面的洪熙街（今红旗街），占地50000坪，建造16893平方米的自诩“亚洲第一”的摄影棚。满映的设立，与其说是适逢“七七”事变，勿宁说日本侵华战争加速了它的出笼。作为“紧急对策”，赶忙招收一批演员，在宽城子设临时摄影厂，开始了故事片的生产。与此同时，满映电影队也活跃于关内的日本侵华战场。

满映成立伊始，即将它所摄制的影片分为“教育映画”、“文化映画”和“娱乐映画”三大类，但各类影片都集中于掩饰

黑暗和炫耀军国主义侵略。满映第一部故事片《壮志烛天》，便是受伪满治安部委托而拍制的“募兵映画”。影片把“讨伐”抗日军血腥暴行和爱情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生拉硬扯，编织在一起，无非是引诱青年为日伪卖命，充当“以华制华”的杀手。继续摄制的《明星的诞生》、《七巧图》、《知心曲》、《蜜月快车》、《大陆长虹》、《国法无私》、《微笑的大地》、《田园春光》等等，也无不起着掩盖侵略和粉饰太平的坏作用。后来，满映又把电影制作分成娱民、启民、时事3个处。娱民电影即故事片，绝大部分都是描写爱情和离奇故事的平庸之作或荒诞货色，诸如《碧血艳影》、《璎珞公主》、《绿林外史》、《求婚启事》、《白马剑客》、《血溅芙蓉》，等等。启民电影是日伪的宣传工具，其中包括关东军报道班拍摄的《守护北方》、《雪的国境》、《北方的部队》、《胜利之响》等反映对苏备战的记录片。至于时事电影就是新闻片，有日语的《满映通讯》和华语的《满映时报》，还有每月1本的《儿童满洲》，以配合其侵略与战争宣传。

《映画法》规定，影片进出口和映演，都必须经伪国务总理大臣指定官署检查。指定官署，初为伪治安部，后为弘报处。他们对于所谓有损于日本与伪满政权者、有损于“皇军”、“皇室”者、有损于殖民政策者、或带有反战和共产主义色彩者，一律禁演。这就断绝了外国和关内影片，而为日本电影的输入和充斥大开绿灯。1936年日本进口影片为154部，1939年扶摇直上，达1630部。此后，也有增无减。法西斯德国影片也打入伪满。^①

电影是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文艺形式。其他文艺形式，特别

^① 如1942年从德国进口影片50部，其中故事片30部，新闻片20部。

是以个人创作为基础的文学活动，相对地比较易于躲避日伪文化统治的罗网。本书前编所述之“六一三”龙江民报社事件和口琴社事件等，虽然使抗日的文学战线遭到严重损失，但是并未全线崩溃。面对日伪的残酷统治，文学战线的斗争艺术倒是更加成熟了。他们的斗争阵地，从报纸副刊转移到回旋余地更大的文艺刊物。诚然，有些期刊系日伪机关所办，充斥着“王道乐土”、“日满亲善”、“民族协和”之类的伪善说教。但是，如同利用报纸副刊那样，民族文学工作者也巧妙地利用它们发表许多富有反抗意识和寓意颇深的作品，甚至还借以开展了对民族文学发展具有促进意义的文学论争。例如：满通社1937年创办的《斯民》半月刊，1938年转为文艺刊物后，吴瑛就曾以不同笔名发表《野孩子》、《女叛徒》、《庸医》等一系列作品；1940年该刊还刊出《诗运建设特辑》，山丁、吴郎、魔女等作家都刊登了作品。1937年3月在伪都新京出现的颇有影响的期刊《明月》，系日本人诚岛舟礼所办，实际经营者却是作家古丁。该刊吸引了不少进步作家及其作品，而且由于该刊发表了疑迟的短篇小说《山丁花》，引起一场关于乡土文艺的文学论争，最后虽无结论，但对抗日爱国的“乡土文艺”主张，却产生很大影响。1939年10月，原属《明月》的一些文人所组成的艺文志事务会，在伪都新京又创办大型文学季刊《艺文志》，它曾先后发表过小松的《蒲公英》、石军的《麦收》、古丁的《平沙》、爵青的《麦》等作品。太平洋战争后停刊，继而又以满洲文艺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的面目而复刊，沦为替日伪效忠的杂志。而早在1939年12月创刊的奉天《文艺》，对《艺文志》初期所暴露出来的不良倾向即有反应，指出应该“在真正的实践中，创造有生命的作品”，发表了一系列寓意深邃的作品。该刊同仁有：陈因、秋萤、袁犀、孟素、王琅、

李乔、李妹等。1939年满洲图书会社还创办了《新满洲》，它以“忠爱孝义为宗旨”，后来成为伪满的“权威”杂志。此外，新京益智书店还刊行大型综合性刊物《学艺》；满洲杂志社出版了《麒麟》。此类刊物都很复杂，公开地大量地为日伪涂脂抹粉。即使如此，仍有若干爱国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利用它们进行文学活动。正因此种情况的存在，日伪步步加紧对文艺界的统治。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组织化”。大体以1941年为线，此后民族文学活动被迫转入低潮。

说到日伪御用文艺团体，首先应是1937年6月30日由大连10余名文人所组成的“满洲文话会”，伪满民生部为其靠山，出版《满洲文话会通信》，编纂《满洲文艺年鉴》，调查内外文化状况，“致力于日满文化交流”，等等。满洲文话会在各地设有支部，并发展组织。不过，更具代表性的日伪御用文艺团体，还应首推1941年9月在伪都新京出笼的满洲艺文联盟。它由满洲文艺家协会、满洲剧团协会、满洲美术家协会、满洲乐团协会、满洲工艺家协会、满洲摄影家协会、满洲作曲家协会、满洲书法家协会、满洲舞蹈家协会、满洲俳句家协会等团体所组成。艺文联盟设有事务局，伪国务院弘报处通过该事务局，统制各协会。它们都是所谓“国策”文艺团体，是以“组织化”之名控制文艺界的罗网。特别是地方团体，更是彻头彻尾的官办团体和文化官衙。例如：牡丹江文艺家协会，会长是伪牡丹江省日本人副省长，两名副会长中还有1名日本人，而5名顾问全都是日本人，他们是：日本驻牡丹江领事、牡丹江铁道局长、商工会长、日本宪兵队长、特务机关长。齐齐哈尔还设有“艺文报国会”，它的由20人构成的领导机关，全系日本人。

日伪文艺统治机构与团体的繁衍，与《文艺指导要纲》的实

施有直接关系。而“要纲”是伪满政府强化文艺统治的重要施策。总务厅弘报处扩大后，首先于1941年3月23日抛出这一全面统治文艺的纲领，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文化，代之以完全为侵略和战争服务的体现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以至全世界的所谓“八纮一宇”的法西斯文化。“要纲”所说的艺文，是从文化大概念中抽出来的特定概念，它包含文艺、美术、音乐演艺、电影、摄影等。而“要纲”所规定的“指导方针”，就是对上述部门进行所谓“育成指导”，制造出一种与其他部门“相互协调”的艺文，把精神上的统治和物质方面的掠夺结合起来。所以，“要纲”实施后，伪满思想文化统治中枢总务厅弘报处，通过御用文艺团体及其统制机关艺文联盟，控制了一切文艺活动。使东北文艺界深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影响并促进文艺发展的结社之风遭到严重破坏，文艺团体的群众性和自由创作精神，悉为日伪直接统辖的“国策文艺”活动所取代。各种文艺家协会和艺文联盟都已沦为“艺文衙门”，在它们的策划下，迫使大批文艺工作者组成所谓弘报队等，为鼓吹侵略战争和战时掠夺而摇旗呐喊。难怪乎大约自1941年起民族文艺活动趋于低潮。但是，文化战线上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斗争并未停止，只是更加尖锐复杂了。日伪文艺专制统治已由作品及于作者本身了。